

全球化的历程与启示

王培喧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DOI:10.61369/ER.2025060027

摘 要 : 在霸主国处于发展阶段时, 往往实行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而在其发展成熟时, 往往会完成从贸易保护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型, 这一时期通常是“有限全球化”时期, 而这一时期往往是其经济高速增长期; 然而, 在其取得绝对霸主地位之后, 它往往会在全球范围内倡导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浪潮, 也就是从“有限全球化”走向“无限全球化”。但这注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航程。因为霸主方构建全球化国际秩序的理念和合法性就是“自由主义”, 但几乎所有的参与方融入全球化的初衷无疑都是“民族主义”的, 这最终会形成“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已经被历史上英国倡导和美国倡导的两次全球化的历程所印证了。

关 键 词 : 贸易保护主义; 有限全球化; 无限全球化

The Course and Enlightenment of Globalization

Wang Peixua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 For the overlord, in its development stage, nationalism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are often practiced; and when its development is mature, it often complet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e protection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this period is usually the "limited globalization" period, and this period is often a period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after its absolute dominance, it often advocates a global wave of liberal globalization, namely from "limited globalization" to "unlimited globalization". But it is destined to be a risky voyage. Because the idea and legitimacy of the overlord to build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liberalism", bu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almost all the participants to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ization is undoubtedly "nationalism", which will eventually form an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iberalism" and "nationalism". This has been confirmed by the two historical courses of globalization advocated b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 trade protectionism; limited globalization; unlimited globalization

引言

在今天, 我们通常把“发达国家”笼统地界定为荷、英、美、德等率先完成现代化的先发国家。但是, 如果我们更加细致地审视它们的历史则会发现, 发达国家之走向“发达”也是有一个先后过程的, 很多发达国家, 甚至包括全球化的霸主国, 也是从“发展中国家”甚至“殖民地国家”起步, 经过不懈努力进而成为发达国家甚至是霸主国的。一般来说, 在霸主国处于发展阶段时, 往往实行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而在其发展成熟时, 往往会完成从贸易保护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型, 这一时期通常是“有限全球化”时期, 而这一时期往往是其经济高速增长期; 然而, 在其取得绝对霸主地位之后, 它往往会在全球范围内倡导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浪潮, 也就是从“有限全球化”走向“无限全球化”。但这注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航程。因为霸主方构建全球化国际秩序的理念和合法性就是“自由主义”, 但几乎所有的参与方融入全球化的初衷无疑都是“民族主义”的, 这最终会形成“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已经被历史上英国倡导和美国倡导的两次全球化的历程所印证了。

一、英国倡导的全球化

英帝国的崛起之路可谓筚路蓝缕、困难重重。它面临着老牌“日不落帝国”西班牙、传统大陆强国法国和号称“海上马车夫”的新兴海洋强国荷兰的强力阻碍。而英帝国崛起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重商主义在英国的良性发展，它使得英国能够克服来自西班牙、法国以及荷兰的强力竞争，最终崛起为近代以来最辉煌的大帝国，并深远影响了后世历史的走向。

（一）贸易保护主义阶段

重商主义在英国的良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与之前的欧洲大国相比，英国更完善地经历了从早期重商主义向晚期重商主义的转变。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孟（Thomas Mun），他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马克思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1]他强调国家的统一领导和最高权威，反对地方主义和分裂行为，认为“一个强有力的国王，他的领土是又大又统一的。”要求臣民“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来维护国王的荣誉。”^[2]这种国家干预的理论与政策极大地改变了英国农业生产的状况和农业经营的方式，使其农业完成了资本主义化；同时，也极大地振兴了英国的民族工商业，为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腾飞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对外贸易方面，孟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他认为通过外贸出超获取顺差是国家致富的唯一手段。他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3]在孟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指导下，英国政府通过关税保护、优惠贷款、许予津贴或贸易特许等方式，保证国内市场，保护国内企业的发展，同时，还培育出了大量的国内中产阶级，也促进了新教伦理在英国的普遍传播，为其工业革命奠定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基础。

（二）单边贸易自由主义阶段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英国在棉纺织、钢铁、煤炭和造船业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工业资产阶级对国外原材料和进口商品的消耗量也与日俱增，原先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工业资产阶级迫切希望打破原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取消进口限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学说最早就是为了反对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提出的，他们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此刻在英国也被更多的人所重视和宣扬。英国从19世纪初期开始着手废除原来实行多年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这段时期，英国实行的是所谓“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也就是虽然也鼓励他国减免关税，但并未以此作为本国开放贸易的前提条件。这种单边自由贸易政策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至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经济进入了高涨时期，并出现了大发展的气象，使得英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垄断地位。

（三）多边贸易自由主义阶段

英国的巨大成功使其倡导的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成为当时欧美各国普遍效仿的规范性意识形态，伦敦

已成为当时欧美市场规则的不成文的管理者。在此基础上，英国的自由主义贸易政策也逐渐从“单边”走向“多边”，开始从全球化的“践行者”变为“倡导者”。然而，如前所述，这种“多边”的（或曰“极端”的、“无限”的）全球化浪潮必然会引发霸主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参与方的“民族主义”国家立场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参与方的欧美各国一方面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以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抵制英国产品的竞争以维护自身的幼稚工业。这种情况终于导致英国倡导的全球化最终分崩离析，各国重新“以邻为壑”。由于这一轮全球化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通过武力手段征服落后民族作为殖民地来扩张世界市场的特性，所以这一轮全球化最终所导致的“以邻为壑”现象表现得尤为惨烈：既然先发国家已经把全球殖民地瓜分完毕，那么全球化浪潮中的后起之秀们就只能通过武力手段去虎口夺食，通过战争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这最终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二、美国倡导的全球化

在英国倡导的第一轮全球化浪潮里，美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当时，美国的商品进出口额通常能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左右。但总体来说，美国与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一样，实行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一）贸易保护主义阶段

1789年，美国第一届联邦政府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现和贯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关税法——《1789年关税法》，该法明确指出“保护和鼓励制造业”。此后的《1816年关税法》侧重于强化对汉密尔顿制造业保护主义思想的贯彻，该法明确指出“规制关税和吨位税”。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规定应税产品的平均税率为48.4%，1897年《丁利关税法》对所有进口品征收的平均税率比1890年还高了2.5%。而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到极端：将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从1922年《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的38.2%提高到了55.3%。^[4]这对保护当时美国的幼稚工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二）“温和”全球化阶段

二战以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作为千疮百孔的战败国暂时退出了国际竞争的舞台，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元气大伤，新兴的红色苏联也在战争中遭受重创。只有美国在战争中大大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力量。然而，它还面临着以红色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力竞争，所以，二战以后美国在构建国际经济秩序时倡导的仍只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或曰“温和的全球化”。它是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核心，以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形式的国际经济体制。这种国际经济体制其实是美国国内中庸调和的“新政”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回顾这一时期，公允地说，以“新政”为代表的“修正的自由主义”和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核心的“折中调和的全球化”创造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高速的经济持续增长，并使得美国最终在与苏联的中央计划型经济体制的“冷战”中获得完胜，

走向了世界绝对霸主的地位。

（三）“极端”全球化阶段

恰如当年的英国一样，美国在成为世界绝对霸主之后，也完成了从“有限全球化”向“无限全球化”、从“温和全球化”向“极端全球化”的转化。当然，这种国际经济体制的转型首先是从其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型开始的。美国首先是在国内放弃了凯恩斯经济学说及“新政”理念，重新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古典经济学派日益成为经济学主流。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修正，那么，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则可以说是对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的修正，即进一步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国家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扩大资本的流动和权力等，此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摆脱了对贸易和劳动力的限制，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作为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1989年经济学家为解决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的经济问题而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它鼓励各国尽可能实行开放和私有化。作为这种转变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美国平均关税税率的大幅度下降，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时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基本保持在6%以上，而近年来已下降到1.3%。”^[5]

不容否认，全球化的确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降低关税鼓励进口，加强了美国的国内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生产率，更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更为廉价和多样化的消费选择，大大降低了生活成本。但与此同时，后布雷顿森林体制的这种“极端全球化”也给美国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首先是低关税使得美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国外商品的竞争对本国的就业形成了冲击。其次是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使得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趋势愈演愈烈，进一步导致失业率上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是，由于自由主义和极端全球化的经济政策放松了政府对经济的管控，使得美国的政府支出没有弥补对外贸易给民众造成的利益损失，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根据美联储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最富裕的1%家庭的财富占全美家庭财富的比例从1989年的30%上升至2016年的38.6%，而底端90%家庭的财富占比则从33.2%降至22.8%。”^[6]另据美联储发布的2016年《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非洲裔、拉美裔家庭与白人家庭之间的资产差距进一步拉大，有高中以下文凭的非洲裔、拉美裔人群家庭收入只占到白人家庭的1/10。”^[7]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访问学者马修·古德温（Matthew Goodwin）预计，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欠佳群体受到的长期负面影响最大，而这些人往往也是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根源所在。^[8]

美国倡导的这种“极端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美国国内的各种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与英国当年倡导的第一轮全球化一样，最终也陷入了霸主方“自由主义”与参与方“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这一矛盾则变得更加激化。尤其是从2016年川普上台、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逆全球化运动甚至出现在了霸主方美国。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包括欧盟、日本、英国等，也均推出了多项保护主义政策和产业政策。^[9]2020年初，全球化遭到严重冲击，全球经济贸易活动近乎停滞，全球产业链濒临断裂，资源短缺引发全球性恐慌。2022年初，世界经济艰难恢复，而俄乌冲突又加重了对全球化未来的悲观预期。全球化发展挑战严峻、困难重重。^[10]无论我们赞不赞同，或者无论我们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都不能不重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反全球化”似乎正在演变成一个全球化的事业。

参考文献

- [1] 李霞.“从重商主义的发展分析英帝国的崛起”,载于《济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 [2] 埃德蒙·塞特克.《经济思想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 [3]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 [4] 郑铁桥、乐欢.“美国早期历史上独特的重商主义思想”,载于《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 [5]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Trade Policy since 1934”, p.59.
- [6] 江宇娟.“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载于《中国证券报》2017年12月30日,第A07版.
- [7] 张朋辉.“贫富差距拉大凸显美国社会不公”,载于《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2日,第21版.
- [8] 徐秀军.“全球财富鸿沟的演进与弥合”,载于《人民论坛》2021年第3期(中).
- [9] 王中美.“新干预主义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载于《国际经贸探索》2022年第5期.
- [10] 卢静:“大变局下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载于《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年第1期.